

我国就业结构变化对劳动生产率影响效应分析

原小能,郑文明,钟懿婧

(南京财经大学,江苏南京 210023)

摘要: 本文分析了我国 1978—1992 年、1993—2001 年、2002—2013 年三个阶段的劳动生产率变化和产业结构的演进,发现了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存在替代关系,之后利用偏离—份额法得出了在三个阶段劳动生产率的各影响因素的变化数据。本文发现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来自产业内部,即来自内生增长效应,而第二产业表现最为突出;劳动力在产业之间流动过程中也存在明显的“结构红利”现象,但是这些特点在不同的阶段又有很大不同,即存在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关键词: 劳动生产率;替代;技术进步;结构红利

中图分类号: F0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6049(2016)04-0028-08

一、引言

经济学者库兹涅茨与克拉克最早将产业结构引入到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之中,他们研究发现产业结构的变化会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的影响,自此产业结构成为经济学的重要研究课题。钱纳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于 1989 年以实证的方式证明了产业结构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变量,之后卢卡斯(1993)也将产业结构引入到其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之中。钱纳里在其知名著作《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中对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小进行了明确的界定,他指出一国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产业结构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小会因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在此基础上,钱纳里还进一步指出发展中国家在这一特征上的表现更加突出,对此他的解释是,在一个经济体之中各部门的生产率与生产率增长率都存在着差异,当所投入的生产要素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或者生产要

素从低生产率增长率部门向高生产率增长率部门流动时,重新配置成的新型生产要素投入模式会促进经济总体生产率的生长。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所谓的“结构红利假说”,即基于要素流动而形成的产业结构变迁会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在此假说的基础上,国内外学者纷纷将各个国家以及相同国家不同时期的统计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由此产生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例如,郭克莎(1993)与蔡昉等(1999)在对于我国农业与非农业之间的要素流动以及三次产业之间的要素流动的研究过程之中均发现,这种基于要素流动的产业结构的变迁会对劳动生产率造成事实上的促进作用。在细分行业时也有类似的研究结论,比如,学者郑玉歆(1993)对我国 1980 年至 1990 年的制造业细分行业数据进行研究时发现,制造业结构的变化会显著的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生长。而国外也有类似的研究结论,Salter(1960)在英国制造业数据研究的基础上发现,

收稿日期:2015-12-2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专项任务项目“坚定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自信研究”(14JDSZK087)。

作者简介:原小能(1972—),女,河南人,南京财经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郑文明(1990—),男,安徽亳州人,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产业经济学专业在读研究生;钟懿婧(1992—),女,安徽蚌埠人,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产业经济学专业在读研究生。

英国在 1924 年至 1950 年间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得益于产业结构的优化而非技术的进步。但这种“结构红利”在不同国家地区以及同一国家地区的不同时期具有着明显的差异,国内外学者对此也进行了相当多的研究。学者吕铁(2002)最早对我国 1980 至 1997 年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数据进行了研究,发现这一时期内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跟劳动力的流动并无直接关联,即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并没有有效的促进制造业总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国外也得到过类似的研究结论, Singh(2004)对韩国 1970—2000 年制造业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结构红利”并没有发生在这一时期的韩国制造之中。还有学者依托跨国数据进行此类研究, Timmer 和 Szirmai(2000)对印度、印度尼西亚、中国台湾以及韩国等四个国家和地区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数据进行研究,他们发现在 1963 到 1993 年间,只有印度的数据支持“结构红利假设”,而韩国、中国台湾以及印度尼西亚都表现不明显,尽管多数国家(地区)的数据没有支持这一假说,但该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发展中国家(地区)更容易产生“结构红利”,也即是钱纳里理论的有效佐证。

二、文献综述

1978 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历了 30 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其中 GDP 年均增长率在 1978—2013 年为 9.7%。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在长期,一个经济体的持续发展依靠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投入的生产要素量的不断增长,另一个是所投入的生产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高。如果一个经济体的扩张只是单纯的依赖投入的生产要素量的增长,那么显然它是难以为继的,毕竟生产要素的量是有限的。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目标,提高生产要素的生产率成为必然选择。如何提高要素生产率?

根据李富强(2008)^[1]王小鲁(2009)^[2]等的研究,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得益于三个方面的原因,分别是产业结构的优化、制度的创新以及技术的进步。由于经济结构的变化而导致的生产率的提高我们称之为“结构红利”,而这主要是因为劳动力从低效率的生产部门转移到了相对较高效的生产部门的原因,在无劳动力增加的情况下实现了更多的产出。学者郑玉歆(1993)^[3]最早对中国制造业

1980—1990 年的 TFP 与产业结构变化之间的关联做出了初步的研究,发现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动对制造业的 TFP 具有贡献作用但是作用较为有限。之后的众多学者在此基础上研究了产业结构与生产率之间的关联,比如,学者吕铁(2002)^[4]对于我国 1980—1997 年的经济数据进行了研究,发现了类似于郑玉歆的结论,即产业结构的变动对劳动生产率有影响但影响甚微。刘伟、张辉(2008)^[5]对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影响因素进行分解之后发现,我国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之间的不断流动确实对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具有重大的促进作用,但是这种促进作用正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相反的,技术进步对于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正在不断地加强。该文章指出,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产业结构的优化而非技术的进步,但是到了 90 年代,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优化对于经济的促进作用几乎持平,大致从 1998 年开始,技术进步成为了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其作用开始大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干春晖、郑若谷(2009)^[6]在估算三次产业资本存量的基础上,发现了我国的产业结构变化速度日趋减慢,而资本结构与劳动力的变动速率却在加快。同时,该文章还指出,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之间的流动具有“结构红利”现象,但资本在三次产业之间的流动却具有“结构负利”现象。对此,张军等(2009)^[7]研究发现,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三次产业之间的要素重置确实对我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即“结构红利”确实是存在的,但大致于 2001 年开始,要素配置效率的下降造成了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下降。王忠(2011)^[8]对我国的劳动生产率与就业增长之间的关联做出了研究,发现二者之间存在较高的替代关系,劳动生产率上升则就业增长率将下降,反之亦然。盖庆恩、朱喜等(2013)^[9]研究了我国劳动生产率与劳动力市场扭曲、结构之间的关联,发现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重大的扭曲,而且这种扭曲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同时,这种扭曲作用使得我国经济造成很大的损失。凡此种种,理论无不说明产业结构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关联。2008 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作为经济增速最快的主要经济体,中国也未能幸免。在外部需求疲软,内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中国原有的

经济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经济增长速度面临着巨大的下行压力,中国经济逐步进入以国内生产总值中高速增长,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新动能不断替换旧动能的经济新常态。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和结构都正在发生着显著变化,如何妥善处理过时产业,如何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目前重要的经济课题。在此背景之下,本文引入新的处理方法,再次对中国就业结构变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效应进行分析,以期为中国经济之良好发展添砖加瓦。

三、模型的介绍与数据的采集

(一) 模型的基本介绍

偏离—份额分析法(shift-share analysis)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丹尼尔·B.克雷默于1942年提出,之后经过都恩、波洛夫等人在20世纪60年代的继承和发展,至80年代初集各家所长所形成的一种具有较高综合性和动态性的经济分析方法。实际上偏离—份额分析法存在两个分支:第一个分支被称为CSSM(constant shift share method),它更注重跨产业的分析,其基于的基本原理是,它将总生产率分解成三个部分,即静态结构效应、动态结构效应以及内部效应。静态结构效应指的是假定在基期,各个产业(或者企业)的生产率水平不产生变化的情况下,不同产业(或者企业)的劳动力通过劳动分工以及专业化所促成的总体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动态结构效应指的是在所考查的时期之内,由于不同产业(或者企业)之间的生产率水平发生了相对变动,而劳动力会沿着不同产业(或者企业)生产率水平变化的方向在不同的经济部门间流动,而这种基于劳动力在不同经济部门之间流动造成的总体劳动生产率水平的变动就是动态结构效应;而内部效应指的是产业(或者企业)内部的生产率增长所对经济总体劳动生产率所产生的影响效应。

第二个分支由Salter(1960)提出,后经过埃德加·胡佛和E. S. 邓恩的发展而来,该方法更注重跨国或者跨区域的分析,将一国一定时期内国内生产总值的同比增长率作为基准,分别测算该国不同区域经济按照全国经济增长率增长可能形成的模拟份额,之后将所得的数据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实际数额相比较,而两种数据之差就是区域经济增长水平与全国平均增长水平的偏差量,

而这种偏差量的产生主要是由区域的产业结构差异与区位因素造成的。根据上述的基本思想,偏离—份额分析法将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因素分解为份额分量、结构偏离分量以及竞争力偏离分量,并根据这三种分量在区域经济结构中所占份额的变动情况与区域经济增长状况的比较,并以此来确定经济结构中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根据优势产业部门所占的比重来确定总体的区域经济结构的优劣。在此基础之上,就可以有目标的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将低效率的产业部门逐渐的转型或者淘汰,不断提高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的比重,从而实现不断增强产业和经济竞争力。本文借助的是偏离—份额分析法的第一个分支,也即CSSM法。基于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本文接下来将对偏离—份额分析法的这一分支做进一步的介绍以及梳理。

偏离—份额分析法(Jan Fagerberg, 2000)^[10]具有较强的综合性与动态性,现该模型已成为在国际学术界用于区域发展差距变动决定因素的基本方法。根据他们的思想,本文将研究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在时间上的变化,以期为我国经济发展方向做出有价值的参考。

现在我们按照通常的做法先对模型中的变量做一下定义,定义 P = 总劳动生产率, N = 总劳动投入, Q = 总GDP数值。

再定义 $i(i=1, 2, 3)$ 表示三次产业, P_i 表示第 i 产业劳动生产率, S_i 表示第 i 产业劳动力数占劳动力总数的份额。

再定义 ΔP 和 ΔS 分别表示基期到 T 期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投入比例的变化。这样做是有很大的好处的,注意公式的推导结果后就可以看出。

根据定义我们可以得到:

$$P = \frac{Q}{N} = \frac{\sum_i Q_i}{\sum_i N_i} = \sum_i \left[\frac{Q_i}{N_i} \cdot \frac{N_i}{\sum_i N_i} \right] \quad (1)$$

其中 $i(i=1, 2, 3)$ 表示三次产业; P 表示劳动生产率; Q 表示产业增加值; N 表示劳动力投入。

根据定义:

$$P_i = \frac{Q_i}{N_i} \quad (2)$$

$$S_i = \frac{N_i}{\sum_i N_i} \quad (3)$$

其中 P_i 表示第 i 产业劳动生产率; S_i 表示第 i 产业劳动力数占劳动力总数的份额。

我们将式(2)和式(3)代入式(1)可得

$$P = \sum_i [P_i S_i] \quad (4)$$

根据定义:

$$\Delta P = P_T - P_0$$

$$\Delta S = S_T - S_0$$

这里 ΔP 和 ΔS 分别表示基期到 T 期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投入比例的变化。

根据式(4)我们可以将公式做以下推导:

$$\begin{aligned} \Delta P &= P_T - P_0 \\ &= \sum_i (P_{iT} S_{iT} - P_{i0} S_{i0}) \\ &= \sum_i [(P_{iT} - P_{i0}) S_{i0} + (P_{iT} - P_{i0}) (S_{iT} - S_{i0}) + P_{i0} (S_{iT} - S_{i0})] \\ &= \sum_i (S_{i0} \Delta P_i + \Delta P_i \Delta S_i + P_{i0} \Delta S_i) \\ &= \sum_i (P_{i0} \Delta S_i + \Delta P_i \Delta S_i + S_{i0} \Delta P_i) \end{aligned} \quad (5)$$

式(4)两边同时除以 P_0 可将劳动生产率增长分解为三个部分:

$$\frac{\Delta P}{P_0} = \sum_i \left(\underbrace{\frac{P_{i0} \Delta S_i}{P_0}}_I + \underbrace{\frac{\Delta P_i \Delta S_i}{P_0}}_{II} + \underbrace{\frac{S_{i0} \Delta P_i}{P_0}}_{III} \right) \quad (6)$$

式(6)等号右边第 I 项表示静态转移效应, 此项的正负性表示在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保持不变, 劳动力从劳动生产率低的产业部门向高劳动生产率产业部门转移时, 该变化对于总的劳动生产率是否有积极影响。如若该项为正, 则表示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产业部门吸收了更多的劳动力, 并增加了该产业的就业比重, 即存在所谓“结构奖赏”, 反之, 该项若为负, 则存在“结构负利”。第 II 项代表动态转移效应, 其主要表示就业结构变化和劳动生产率变动的共同作用对总劳动生产率之影响。若劳动生产率和就业比重均同时出现上升或同时下降, 则该项值为正; 若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产业无法维持其现有的就业比重, 或具有较低劳动生产率的产业吸纳的就业比重出现了上升, 则该项值为负。如果该

项值为负, 劳动力在产业之间的再分配对总劳动生产率即构成了“结构负担”。第 III 项代表内部增长效应, 其主要衡量不存在结构变动(即各产业的就业比重保持不变之情况)下, 三次产业自身的劳动生产率变化对总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状况。

(二) 数据说明与处理

劳动生产率是指一个经济体内平均每个就业人员所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 就业是指该经济体内(通常是一国)所有从业人员的数量, 由此就可以将劳动生产率表示成国内生产总值 GDP 与总体就业人数(N)的比值。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本文收集了我国从 1978—2013 年的经济数据, 其中包括我国劳动力就业总数数据、三次产业的就业人数、我国历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以及三次产业国内生产总值数据。而其他数据都是由基础数据计算得来的, 三次产业就业比重的变化, 它是由三次产业分别的就业人数除以总的就业人口数据在时间上的变化情况。数据并无刻意的进行处理, 以此方便理解。

四、实证结果的分析与讨论

以下我们对各基期劳动生产率进行了计算。如表 1 所示, 而对于从 2002 年以来的数据我们进行了逐年的分析, 而这主要是为了更细致的描述近几年尤其是逐步进入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过程中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虽然略显冗长, 但笔者认为这是更好的阐述文章所必须具有的部分。表 1 是关于各基期的三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 表 2 是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数据, 虽然数据略显繁多, 但是其蕴含的内容却简单而深刻。

从表 1、2 可以看出, 对于三个阶段, 三次产业总体而言: 劳动生产率均有所提高, 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与二、三产业之间的巨大差距, 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高于一、三产业, 且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远高于第一产业, 而总体的劳动生产率一直处于一、三产业劳动生产率之间, 这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我国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依然占据总就业人数的较大比例, 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与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之间没有较大的差距, 而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却远低于第二、三产业, 这就使得总体劳动生产率一直高于第一产业而低于第

三产业。从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变化这一栏可以看出,第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进步一直高于第一产业,尤其从大致1992年开始这种增长率之间的差距被显著的拉大了。而1978到1992之间的这段例外可能主要是因为我国将“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了全面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经济建设上来,尤其是“家庭联产责任制”的实施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使得我国劳动力资源配置逐步走向了市场化,计划经济时代生产和销售完全靠行政指令所造成的劳动力生产要素的扭曲也得到了不断地更正,尤其是我国农村积蓄的大量剩余劳动力不断地从生产率低下的农业部门向着生产率水平相对较高的工业转移的过程,对我国总体劳动生产率的提供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商品市场上

还普遍的存在短缺现象,尤其是食品、家电等生活用品经常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其他的商品也存在类似的特征,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劳动力市场的这种扭曲现象得到了逐渐改善,劳动力流动的积极作用逐渐减弱。有一个事实不应该忽视,三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化率是趋近的,这种趋势从2008年开始表现的更加明显,三次产业中原来差距最大的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变化率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变化率,前者原来仅是后者的五分之一,而到2013年左右时已接近其二分之一,这种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变化率趋近的结果使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变化幅度趋近,尽管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之间差距依然会拉大,但这种拉大的幅度已越来越小,这种趋势与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我国逐步进入经济新常态的背景相吻合。

表1 各基期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

	P_0	$P_{1,0}$	$P_{2,0}$	$P_{3,0}$
2012年	6.96343	1.97465	10.33520	8.77681
2011年	6.33504	1.73548	9.90908	7.86526
2010年	5.37288	1.40902	8.64408	6.86394
2009年	4.55807	1.18219	7.48807	5.94127
2008年	4.19183	1.09436	7.20552	5.41738
2007年	3.55836	0.90407	6.19961	4.71607
2006年	2.90294	0.72989	5.45998	3.77668
2005年	2.49033	0.65198	4.90416	3.28360
2004年	2.16410	0.60011	4.40051	2.91676
2003年	1.85207	0.46868	3.90035	2.66034
2002年	1.65123	0.44183	3.41951	2.44244
1993年	0.53174	0.18278	1.09409	0.86593
1978年	0.09091	0.03596	0.24996	0.18319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表2 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变化

	ΔP_1	ΔP_2	ΔP_3
2012~2013	0.31411	0.74853	0.53237
2011~2012	0.23917	0.42612	0.91156
2010~2011	0.32646	1.26500	1.00131
2009~2010	0.22683	1.15601	0.92268
2008~2009	0.08782	0.28256	0.52389
2007~2008	0.19029	1.00590	0.70131
2006~2007	0.17418	0.73964	0.93938
2005~2006	0.07790	0.55582	0.49309
2004~2005	0.05187	0.50365	0.36684
2003~2004	0.13143	0.50016	0.25642
2002~2003	0.02685	0.48084	0.21790
2002~2013	1.84693	7.66422	6.86674
1993~2001	0.24309	1.94047	1.39084
1978~1992	0.11391	0.56093	0.55188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而从单个年份来看,从2002年开始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波动较大,尤其是2003到2004年度和2008到2009年度,2008年之后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变化一直保持较快速度,且没有出现大幅波动。第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变化却并非如此,尤其是2011到2013年均出现明显的下滑,尽管第二产业下滑出现了回升,但第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变化总体的下滑趋势足以说明新常态背景下的第二、三产业的增长乏力,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变化率持续下降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在服务业领域的创新不足。之后本文运用结构—份额分析法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总体劳动生产率以及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分成三个阶段进行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三次产业劳动投入比例的变化

	ΔS_1	ΔS_2	ΔS_3
2002 ~ 2013	-0.18600	0.08700	0.65410
1993 ~ 2001	-0.06400	-0.00100	0.17813
1978 ~ 1992	-0.12027	0.04403	0.16578
2012 ~ 2013	-0.02200	-0.00200	0.15172
2011 ~ 2012	-0.01199	0.00799	0.04851
2010 ~ 2011	-0.01900	0.00800	0.08309
2009 ~ 2010	-0.01400	0.00900	0.04777
2008 ~ 2009	-0.01500	0.00600	0.05663
2007 ~ 2008	-0.01200	0.00400	0.04427
2006 ~ 2007	-0.01800	0.01600	0.03825
2005 ~ 2006	-0.02200	0.01400	0.05498
2004 ~ 2005	-0.02100	0.01300	0.04844
2003 ~ 2004	-0.02200	0.00900	0.05571
2002 ~ 2003	-0.00900	0.00200	0.02474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从表3与表4可以看出,1978—1992年阶段到1993—2001年阶段,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了几乎一倍,第二期中第一产业劳动力投入减少量的比例只是前一期的一半左右,可以看出在此阶段劳动生产率与就业增长之间存在替代关系,1993—2001年阶段与2002—2013年阶段却

不符合此关系,可见劳动生产率与就业增长之间存在替代关系,这种替代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具有着阶段性的特征。类似,我们对于二、三产业的数据进行考察亦发现有此规律,即劳动生产率与就业增长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同时这种替代关系具有阶段性的特征。还有一个现象需要注意,由表3和表4可以看出,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一直在三次产业中最高,第二产业却不一直是接受劳动力增长最多的部门,比如1993—2001年度,尽管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基期值为1.09,劳动生产率变化率也是最高,现实的三次产业劳动力变化情况却是:第一产业劳动力投入比例下降了6.4%,第二产业劳动力就业下降了0.1%,第三产业劳动力就业增长了近18%。还可以根据其他期的数据发现此现象。综上可以有一下结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之间的流动过程中存在明显的“结构红利”现象,即劳动力在向劳动生产率更高的部门转移的过程中伴随着总体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产业部门对劳动力具有更强的吸引力,实际的吸收量具有着阶段性特征。

表4 三阶段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及其分解

Total change			I		II		III	
			数值	贡献/%	数值	贡献/%	数值	贡献/%
1978 ~ 1992	第一产业	0.68544	-0.04758	-6.94	-0.15070	-21.99	0.88372	128.93
	第二产业	1.46001	0.12107	8.29	0.27169	18.61	1.06725	73.10
	第三产业	2.38870	0.33405	13.98	1.00637	42.13	1.04828	43.89
	总计	4.53415	0.40755	8.99	1.12736	24.86	2.99925	66.15
1993 ~ 2001	第一产业	0.23584	-0.02200	-9.33	-0.02926	-12.41	0.25784	109.33
	第二产业	0.81538	-0.00206	-0.25	-0.00365	-0.45	0.81744	100.25
	第三产业	1.27323	0.29007	22.78	0.46591	36.59	0.98316	77.22
	总计	2.75746	0.26601	9.65	0.43300	15.70	2.05844	74.65
2002 ~ 2013	第一产业	0.30145	-0.04977	-16.51	-0.20804	-69.01	0.55926	185.52
	第二产业	1.57726	0.18017	11.42	0.40381	25.60	0.99329	62.98
	第三产业	6.06633	0.96752	15.95	2.72010	44.84	2.37870	39.21
	总计	7.94504	1.09792	13.82	2.91587	36.70	3.93125	49.48

三次产业劳动力所占总劳动力的比例在表3中有清晰的表述,在表4中我们给出了三次产业劳动投入比例的变化,而这又是为了对表四的说明。在三阶段中,内部增长效应都占有较大份额,内部增长效应在三阶段的占比分别达到了66.15%、74.65%、49.48%,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产业内部增长效应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导因

素。静态转移效应在三个阶段均有着逐渐的提升趋势,动态转移效应的变动表现为颠簸式的上升,这两者所组成的结构效应在三个阶段分别为33.75%、25.35%和50.52%,这表明劳动力与产业结构的变动确实存在着明显的“结构红利”特征。不应该忽略的一个事实是1993年到2002年这一阶段“结构红利”出现了明显的降低,换

句话说,在该阶段,内部增长效应相对结构效应获得了更大提高,这可能是因为1992年中国确立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得先前被扭曲的市场结构逐渐合理化,被扭曲的产业结构得到了明显的优化,因而“结构红利”迅速的降低了。考虑到在2002—2013年度中国并没有出现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巨大利好,且中国基于比较优势、依赖外需出口的发展战略越来越难以为继,依赖低端的加工制造业与复制模仿的方式并没有有效的改善,此阶段的结构效应贡献率的增加,则可能是内部增长效应因为缺乏有效的技术创新而降低,从而使得结构效应所占的份额被动地增加了。对于1992年开始的由于经济体制转型所产生的巨大“体制转型红利”也会随着时间而逐渐的减弱,在没有巨大利好的情况下,“结构红利”是逐渐减弱的。

现在从三次产业的角度再来考察三次产业结构变动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联。从表四可以看出,在三个阶段对于第一产业而言均不存在所谓“结构奖赏”,反而是存在“结构负债”,这种二、三产业对第一产业不断地侵蚀迅速改变了原有产业结构,在客观上创造了较大的能量并有效的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相较于第一阶段,1993—2002年这一阶段的第二产业的静态转移与动态转移指数均为负值,这一现象在三个阶段中是独有的,这也可以说明在此阶段第二产业的结构效应非常弱,也反衬出产业内部增长效应居于更重要的地位。上述论断可以佐证前文之结论,即施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中国先前被扭曲的市场结构得到了很大的改善(高煜,刘志彪2008)^[11]。三次产业在三个阶段其动态转移效应均存在大于其静态转移效应的现象,从第二产业看,第二产业技术进步特征相较于一、三产业更加明显,造成事实上的第二产业内部增长效应在总体上的下降与其进步更明显的特征之“不协调”也恰可以说明:从2002到2013年这一阶段技术进步对于劳动生产率的效应在下降,中国大力发展高端制造业依然大有可为。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分析了我国1978年以来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变化,以及由此对于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情况,并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对其进行了量化分析,从中得出了以下结论:首先,中国长期以来存

在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的现象,并且这种转移现象存在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劳动力在第二、三产业中所占份额也不尽相同,如在1978—1992年阶段,第一产业劳动力投入比例下降12%,而第二产业新增就业比例约4%,第三产业新增就业比例约16%。1993—2001年度,第一产业劳动力投入比例下降了6.4%,第二产业劳动力就业比例下降了0.1%,第三产业劳动力就业新增近18%,这主要可能是因为1992年开始我国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私营企业的蓬勃发展,外资的大量进入。目前中国对于外资的投资领域限制仍然较多,资金和技术更多的进入了劳动生产率不是最高的第三产业,由此造成了劳动力的异常流动(刘志彪2011)^[12]。其次,劳动力要素转移存在明显的“结构红利”现象。劳动力的转移通常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通常向着劳动生产率更高的部门转移。造成第二产业作为劳动生产率最高的产业部门却没有一直成为接受劳动力最多的产业,其中的原因更多还是体制性的,一方面,中国户籍制度的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另一方面,中国在市场经济逐步确立的过程中,计划经济时代所造成的行业准入门槛扭曲并没有完全解除,“政府的手”代替市场“看不见的手”的现象依然大量存在。再次,在前两个阶段,内部增长效应一直在劳动生产率提高过程中扮演主导因素,在2002—2013年度内部增长效应的贡献率为49.48%,已略低于一半,内部增长效应对于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作用的阶段性特征可见一斑。最后,具有阶段性特征的劳动力因素在转移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结构红利”是在不断流失的。针对以上的经济发展状况,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考虑对策:首先,我们应该努力降低行业之间的准入门槛,使得劳动力可以较容易的自由流动。其次,是我国企业在GVC中地位跃升问题,在发展高附加值的产业上,中国企业要展现更多的努力(徐宁,皮建才,刘志彪2014)^[13]。最后,在新一轮的全球化发展方向上,中国政府与企业之间要有更加良性的互动,要善于把握机遇^[14]。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我们必须从更高的层次上把握经济发展方向,制定出科学合理的经济发展战略。为了更好地服务与经济建设,经济要素要实现良性的互动,在保证经济平

稳的同时扩大新的增长空间^[15]。

参考文献:

- [1]李富强,董直庆,王林辉.制度主导、要素贡献和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的分类检验[J].经济研究,2008(4):53-65.
- [2]王小鲁,樊纲,刘鹏.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和增长可持续性[J].经济研究,2009(1):4-16.
- [3]郑玉歆.80年代中国制造业生产率变动及其来源[M]//郑玉歆,罗斯基.体制转换中的中国工业生产率.北京:社会科学文化出版社,1993:86-96.
- [4]吕铁.制造业结构变化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研究[J].管理世界,2002(2):87-94.
- [5]刘伟,张辉.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变迁和技术进步[J].经济研究,2008(11):4-15.
- [6]干春晖,郑若谷.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演进与生产率增长研究——对中国1978—2007年“结构红利假说”的检验[J].中国工业经济,2009(2):55-65.
- [7]张军,陈诗一, Gary H. Jefferson. 结构改革与中国工业增长[J].经济研究,2009(7):4-20.
- [8]王忠.劳动生产率增长与就业增长替代关系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1(5):59-65.
- [9]盖庆恩,朱喜,史清华.劳动力市场扭曲、结构转变和中国劳动生产率[J].经济研究,2013(5):87-97+111.
- [10]Jan Fagerberg. Technological Progress, Structural Change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A Comparative Study [J].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2000: 114.
- [11]高煜,刘志彪.我国产业结构演进特征及现实问题:1978~2006[J].改革,2008(1):73-79.
- [12]刘志彪.发展战略、转型升级与“长三角”转变服务业发展方式[J].学术月刊,2011(11):71-77.
- [13]徐宁,皮建才,刘志彪.全球价值链还是国内价值链——中国代工企业的链条选择机制研究[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4(1):62-74.
- [14]张少军,刘志彪.国内价值链是否对接了全球价值链——基于联立方程模型的经验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13(2):14-27.
- [15]刘志彪.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基本路径与长效机制[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4-10.

(责任编辑:黄明晴)

Analysis of Impacts of Changes in Employment Structure on Labor Productivity in China

YUAN Xiaoneng, ZHENG Wenming, ZHONG Yiji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nges of labor productivity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three stages: 1978—1992, 1993—2001 and 2002—2013. The authors have discovered substitution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increase of labor productivity and the employment growth and have used shift-share methods in order to obtain data changes in various influential factors of labor productivity in three stages. The authors have also discovered that the increase of labor productivity mainly comes from the interior of the industry as known as the within-growth effect, and it outstands in the second industry; there is a “bonus structure” phenomenon in the process of labor flow between industries, however, there exist obvious stag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labor productivity; replacement; progress of technology; bonus structure